

四川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资助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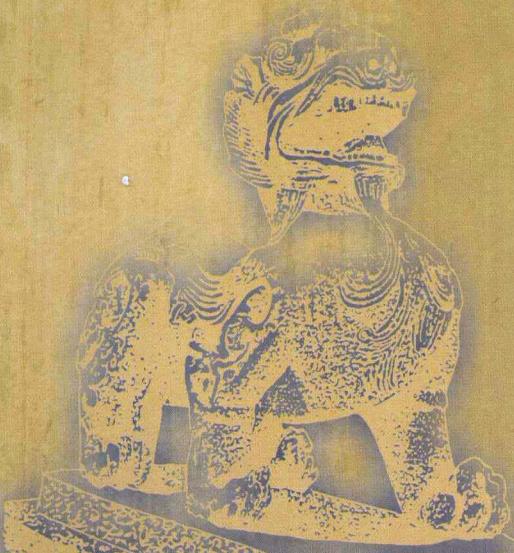
王定璋◎著

学海蠡测

——文史思辨录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王定璋◎著

学海象烛测

——文史思辨录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海蠡测 / 王定璋著 . —成都 : 巴蜀书社, 2009. 10
ISBN 978-7-80752-474-8

I. 学… II. 王… III. 古典文学—文学史—中国—文集
IV. I209.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0490 号

学海蠡测——文史思辨录

王定璋 著

责任编辑	李 嘉
封面设计	邵晓锋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028)84122206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2mm×140mm
印 张	21.5
字 数	55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474-8
定 价	35.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序	(1)
饮酒与服食——阮籍、嵇康的人生悲剧	(3)
试论晋宋之际的诗坛双星——陶渊明、谢灵运 ...	(11)
谢灵运与“大历十才子”	(26)
道教文化与唐代诗歌	(43)
试论唐代诗歌繁荣与思想解放	(55)
松花笺写洪度诗——论唐代娼妓的诗歌	(70)
唐代山水旅游诗折射的文化心态	(87)
浔阳襄阳二诗豪——论陶渊明、孟浩然的人生 追求与文学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	(105)
“运去不逢青海马” ——略论中晚唐的咏史诗	(117)
陈子昂与沈佺期、宋之间	(131)
陈子昂山水诗的个性特征与时代意义	(149)
诗坛飘逸两俊杰——论李白与谢朓	(165)
李白文章管窥	(186)
论李白的主体意识——兼论历代对李白评价	(199)

李白艺术风格的文化渊源	(216)
李白的兴趣爱好与心理特征浅探	(230)
李白待诏翰林时期作品探索	(243)
盛唐气象与青春追求——略论李白、杜甫青年时代的诗歌	(259)
杜甫漂泊湖湘时期诗歌探索	(272)
钱起诗歌艺术风格初探	(288)
钱起部分诗歌系年	(296)
《钱考功集》考辨	(314)
钱起交游考	(327)
“婉雅闲淡 语近性情”——论司空曙的诗歌	(338)
“矜负好句 自比柳谢”——雍陶诗歌简论	(354)
李商隐咏史诗的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	(369)
“霸才无主始怜君”——论温庭筠的咏史诗的伤时情结与刺世精神	(385)
“撑霆裂月”说是非——论司空图的为人及诗歌	(398)
唐祚运移悲丧乱 是非纷纭说《香奁》 ——论韩偓的诗歌	(414)
试论郑谷的诗歌	(427)
《唐代诗人丛考》补正两则	(444)
宋人学唐诗散论	(450)
试论苏轼的“和陶诗”	(463)
略论苏轼赋的思想意趣与审美追求	(479)

论中国传统小说的演进特征	(490)
论冯梦龙《三言》中的冤假错案	(501)
《三言》中的科场众生相	(517)
《三言》中的人情伦理	(527)
《三言》中的爱情题材	(541)
“明德慎罚”——《尚书》的“以德治国” 思想探析	(559)
从敬天保民到敬德保民——《尚书》中神权 政治的嬗变	(572)
“刚制于酒”——《尚书》戒酒令的历史意义 与时代价值	(588)
从“庶狱庶慎”到“惟良折狱”——《尚书》刑法 观念的形成、发展与特征	(599)
谯周与陈寿	(615)
论姜维的是非功过	(634)
唐代司法监察得失谈	(647)
唐代地理学热的兴起与《元和郡县图志》	(654)
唐代的考试制度与人才选拔	(660)
南唐三主的人品及政治	(668)
后记	(682)
主要著作	(683)

序

此书是作者涉足文史研究以来的心得与体悟。文史领域，浩瀚广博，深不可测。由于作者的工作关系及兴趣爱好的驱使，对文史渊海进行了个人力所能及的探析与阐释，30余年也略有所得，迄今为止，已发表文史学科方面的学术论文130余篇。此书即从这些论文中遴选岀40多篇结集成册。这对于渊深浩渺的学术海洋而言，自然微不足道，犹之于以蠡测海。然而，观一滴水而知沧海，以小见大，实为学术研究之有效途径。

此书以文学和史学两大体系结构而成。而文、史学科各以其不同的论题展衍开来。大体而言，文学研究以魏晋南北朝、唐、宋及明代为主干建构体系。魏晋南北朝以陶渊明、二谢（谢灵运、谢朓）为核心，旁及其余；唐代则以李白、钱起及“大历十才子”中的其他成员以及中晚唐作家中作者感兴趣的为重点对象；宋代的苏轼、明代的小说也是此书关注的重要环节。史学方面，则以《尚书》、《三国志》及两《唐书》的研究篇目为多。这些论文，均为作者独立思索所得，虽与传统不同，却是作者沉思考辨的结果，无不持之有据、言之成理，故谓之“思辨录”、“存异录”可矣。

要之，此书较扼要地反映了作者在文史渊海方面的

兴趣所在与耕耘所得。所选的论文，一般都在学术刊物上刊露，且有两次或多次反响。有的被辑入高校教材，有的被人民大学资料中心全文复印，有的被其他学术刊物评介、转载、摘引、选目……这正是此书结集成书付梓的潜在动力，也算是对作者多年学海笔耕的心灵慰藉。

学海无涯，精力有限，老冉冉不知其将至；然则仍须负力前行，黾勉问学，不可懈怠。

作者谨识

2009年春·成都



饮酒与服食

——阮籍、嵇康的人生悲剧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处于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变化最为明显的莫过于个体的自觉、人性的觉醒和人的主题意义的确立。其时，人们开始从西汉经学的迷雾中醒来，逐渐向自我意识靠拢。先前儒家重事功、重道德完善和个体外在操守，强调个体的社会责任等已经不再成为唯一的人生价值坐标了，人们开始关注自我，呼唤个体存在意识，注重向表现个体精神世界的才情、气质、仪容、神韵等方面转化，更看重个性的自由发展与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在这里，我们必然便会想到终日昏饮的阮籍和讲究服食的嵇康来。

阮籍（210—263）是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建安七子”中阮瑀的儿子。他生长在家庭教育良好、文学氛围浓郁的环境中，这势必会对他的自身修养和性格气质产生巨大的潜在影响。不幸的是他3岁丧父，又经历了魏晋易代前期的政治巨变（西晋于公元265年代魏自立），



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和风波时起的统治集团的内部倾轧，影响着阮籍的成长，也规定着他那狂傲独特的个性形成。他平生的两大爱好是读书和饮酒。与西汉时代不同的是，阮籍所读之书除了传统的儒家典籍之外，还有向往自由、渴望思想解放、不循礼法的道家著作《老子》和《庄子》。

阮籍生活的时代尽管仍然是曹魏的江山，然而势力日益膨胀的司马氏集团早已羽翼丰满，大权在握，不少文化人都成为政客们争权夺利的牺牲品。像此前的孔融、何晏，后来的嵇康、陆机、陆云、张华、潘岳、郭璞、谢灵运……因而当时有“名士少有全者”的说法。阮籍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却能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审时度势，把握好自身命运，以适应险恶的世道，不至于成为政客们的俎上肉。酒就是阮籍的保护神。当他听说步兵校尉营中有一名善酿佳酒高手贮存有好酒 300 石时，便去做了步兵校尉，以满足他对美酒的迷恋。他终日酣饮，创造出连续 60 天酩酊大醉的惊人纪录。如果那时也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话，相信阮籍是会入选的，并可能不会被后人轻易打破。

当然阮籍绝不是为饮酒而饮酒的酗酒者，他的昏饮实在是蕴含着特殊的用意。阮籍的父亲是曹氏集团的成员，自然与曹魏的政权关系密切。而当阮籍入仕为官之后，这时的江山虽然仍然在曹氏手中，但是，权势显赫的司马氏早已完全控制住了朝政。司马氏对于阮籍这样朝野知名的文化人早有拉拢之念，并且希望和阮籍联姻。这对那些趋炎附势的人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大喜事了，可阮籍是绝对不愿意的；然而他既不便公开拒绝司马氏的拉拢，又要与之保持一定距离，因此只好托之于酒，

终日沉醉酒乡……

阮籍为人狂傲放诞，任性不羁，更有一般人不具备的“青白眼”——对于他根本不愿交往的人，一概以白眼拒绝。好友嵇康的弟弟嵇喜是个重礼法的人，就受到过阮籍的白眼冷遇。然而，当他喜欢的嵇康提着酒壶，携一张古琴来拜访他时，阮籍则露出了和善的青眼！

放诞任性的阮籍善于长啸，经常在屋内和野外仰天长啸。这实际上是东汉以来一些闲逸名士和隐士展示自我不同凡响的独特方式，以此排遣胸中的块垒。《世说新语·栖逸》篇里曾说：“阮步兵（籍）啸闻数百步”，“兀然长啸，以此终日”（《魏氏春秋》）。依据上面的一些资料，如果把阮籍理解成为一个放纵的狂人就太皮相了。阮籍的儿子阮浑自小受其父的濡染，也养成了“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的习惯，可是却受到了阮籍的指责。他告诫儿子决不能学他的模样。可见阮籍对自己行为的认识是十分清楚的。阮籍的狂是“佯狂”，醉是“假醉”。他正是用这种“佯狂”和“假醉”来保护自我，避开了迫害和麻烦。阮籍在“佯狂”和“昏饮”里营造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安全的生存空间。

阮籍的处世谨慎、说话幽深是其又一道护身符。史籍称他喜怒不形于色，城府很深，“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所谓发言玄远，是说他的话具有很大的飘移性和虚幻性，令人无法把握其真正用意。至于“口不臧否人物”，更是一般人难于达到的境界。据史书记载，阮籍年轻的时候，跟随叔父到东郡，兗州刺史王昶久仰他的大名，很想延他到幕府做幕僚，可是阮籍终日不说一句话，让王昶根本无法了解他在想什么，就这样避开了官场纠葛。阮籍哭途穷，也是很有名的故



事，折射出他的彷徨和苦闷。

阮籍发言玄远，在他那著名的《咏怀诗》82首中有所体现。我们不妨来看一看第一首：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

诗人夜不能寐，弹琴无绪，那只飘零迷茫的孤鸿，正是诗人孤寂无依的写照。令人伤心的忧思总是缠绕着自己；可为何而忧思，所忧又是什么内涵，始终令人无法捕捉。如果我们把《咏怀诗》的其他内容联系起来观照的话，“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的自然景物的变幻与政治变动的暗示以及“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的忧虑，“终身履薄冰，夜知我心焦”的痛苦等等，不正是处于魏晋易代前夕诗人对政治风暴的焦急与忧虑么？这自然也夹杂着人生哀伤与复杂的世道感慨了。

即便如此，我们也很难准确捕捉阮籍诗歌的旨意，这是因为阮籍诗中大量比兴手法的运用，象征笔墨的浓重，给人一种“阮旨遥深”（刘勰语）的印象，呈现出一种“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的艺术特征，从而形成一种“百代之下，难以情测”的迷离景象。大约正是阮籍妙于采用比兴和象征手法，所以他能度过一个又一个的政治陷阱和人身迫害，嗜酒昏酣和出言谨慎就是阮籍身处乱世的重要保护神灵。

比阮籍小十几岁的嵇康（224—263）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此人身材伟岸，仪表堂堂，风神秀拔。“竹林七

贤”中的山涛是他的朋友，称誉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然而具有如此形质风神的嵇康却很不修边幅，时常衣履不整，蓬头见客，扪虱而谈，旁若无人，是魏晋风度中的另一类型。

嵇康博极群书，尤喜老庄，并且公开宣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这也是身处当时特定政治环境之下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表白自己“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他为自己设计的人生道路则是“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新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但是，这仅仅是一个侧面，是他对当时风波不定的政治气候深刻认识之后，从老、庄哲学中汲取了向慕自由，不羨荣名思想营养之后而作出的人生选择。然而，我们从他的《养生论》中可以认识到他热爱人生的另一面。他喜欢服用“寒食散”（五石散），追求长生久视，因而主张的养生之法是静心怡性与服食良药的结合。他认为应当做到不营“名位”以“保神”，不贪“厚味”以“全身”，把心理修养和生理锻炼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生，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惑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

客观地看，嵇康养生之论，即将神养和药养巧妙结合，心理和生理相互兼顾的观点是有其合理性的。透过一篇是《养生论》，我们是不应该把嵇康看成是消极颓唐之辈的。如果说阮籍因父辈的关系与曹魏政治集团关系密切的话，那么，嵇康与曹氏集团的关系显然比阮籍还要密切得多。嵇康的妻子就是曹操的儿子曹林的女儿，宗亲的身份必然会给他带来不少的麻烦。嵇康又是一个

善于动脑筋、好发奇想的探索者。他写过一篇《卜疑集》，这是一篇探索人生哲理的文章。他一连串地提出了关于人生的30多个疑问，似乎都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

嵇康不同于阮籍，他是一个锋芒难掩的狷介之士，任侠尚气，疾恶如仇。据有关资料记载，嵇康和好友向秀在柳树下打铁，司马昭的心腹钟会带领了一帮名士来拜访他，嵇康毫无假饰，根本不予理睬，仍然打铁不止，把权臣钟会搞得十分尴尬，只好败兴而去。嵇康当时只说了相当简单的两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则回答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嵇康如此对待司马氏集团的心腹，自然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最能体现嵇康峻急刚直秉性的莫过于《与山巨源绝交书》了。山涛原本“竹林七贤”成员，与嵇康相知颇深，但是，山涛后来改变初衷，进入仕途，做了吏部尚书，还准备举荐嵇康出任尚书吏部郎。嵇康并不买账，认为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所以写下了千古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斥责山涛的失节入仕，高倡自我的完善和人格独立，声称自己不能出仕是因为“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充分展示了兀傲狷洁的个性。此外，嵇康的《与吕长悌绝交书》也颇能展示其嫉恶刚肠的禀性。

在嵇康的爱好中弹琴和赋诗是不能不提及的。他声称“弹琴咏诗，聊以忘忧”，可见在弹琴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为此，他还写过一篇《声无哀乐论》的音乐论文以及为人所熟知的《琴赋》，阐述他关于音乐及美学方面的见解。为嵇康招致麻烦的是他在《释私论》中所表现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这自然是对于儒家的礼法思想和伦理道德的挑战；加之嵇康缺乏阮籍那样的处世之法，有意无意地得罪了司马氏集团中的权贵，司马氏集团终

于选择了吕安事件把嵇康逮捕下狱，加以迫害。

嵇康被捕之后，引起了朝野的广泛关注。当时京城太学生 3000 多人集体上书请愿，请求宽免嵇康，并且要拜嵇康为师。更有不少的名士向朝廷表示抗议，愿意跟随嵇康入狱（详见《世说新语·雅量》注引王隐《晋书》）。朝野舆论的支持，原本是向司马氏集团施加影响，以便宽免嵇康，谁知适得其反，倒使司马氏进一步认识到嵇康的声望及危害。在这关键时刻，钟会公报私仇，大进谗言。据《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

（嵇）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

作为一代名流、魏晋风度之翘楚的嵇康，就这样惨死在司马氏的屠刀之下。据史料记载，嵇康临刑时，神色自若，“倾视日影，索琴而弹”，并且长叹一声：“《广陵散》于今绝矣！”带着满腹遗憾，离开了他热爱的人世。

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都有些接近的阮籍和嵇康，生活的时代也是大体重合的，可为什么二人的结局却有如此大的差异呢？原因当然是十分复杂的，不少学者也进行过探析。我倒觉得鲁迅先生的一段话不乏真知灼见：“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康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人事。”（《魏晋风度及文



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无论吃药也好，饮酒也罢，身历乱世的文人是痛苦而忧虑的。嵇康的死是悲剧，阮籍的佯狂又何尝不是悲剧呢！



试论晋宋之际的诗坛双星

——陶渊明、谢灵运

陶渊明（365—427）和谢灵运（385—433）是我国晋宋时期的重要诗人。陶渊明比谢灵运大20岁，却只比谢早去世6年，可见二人生活的时代是很接近的。陶诗中最早的《命子》诗是渊明初得长子俨时之作，时年29岁。谢灵运于18岁时即袭封康乐公，《宋书》本传称谢“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可见，二人的创作年代比他们的年龄差距还要小得多。他们都经历了由东晋转入刘宋的历史时期，这是本文将陶谢进行比较研究的根据之一。此外，二人都有过隐居——入仕——再隐居的经历，这也是值得寻绎的文化现象。陶谢的政治态度、哲学思想、家庭环境、文学创作虽不相类，但都对后世的文学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一个是平淡恬静诗风的鼻祖，一个是富艳精工诗派的开山；一个是被奉为隐逸诗人的典范，一个是政治追求强烈的贵胄；一个是田园诗人的正宗，一个是山水诗派的奠基人。将陶谢